

世界文明：一个还是多个

■ 陈恒

论衡

人工智能强势下 人的作者处境

■ 编译/黎文



《中华箴言录》(Sapientia Sinica, 又译《中国智慧》, 1662),系葡萄牙传教士郭纳爵改进利玛窦的翻译,与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一起摘选的经典译本,包含孔子生平2页、《大学》部分14页、《论语》前5章,中文、拉丁文对照。

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是双向的,知识流通、学术研究亦是双向的

知识和思想是单向传播的,从而建立起中心和边缘的空间等级,这是人们常见的假定,尤其是在强势文明影响下,人们的思维更是如此。近几十年来,跨国史、全球史、交织史促进了对知识和文化交流更具包容性的理解。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是双向的,知识流通学术研究亦是双向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东学西传”这一命题的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西方是如何选择中国经典、如何翻译中国经典的?西方是如何理解中国文化、如何研究中国文化的?自《马可·波罗游记》以来,究竟出现了多少种“游记记录”,这些记录反映了怎样的社会需求?西方是如何编纂汉语工具书、词典、教材的?等等。如果不进行文献汇编、文献集成、目录汇总这类基础性工作,深入研究就很难实现。因为这些原始文献涉及的语种不仅非常广泛,而且散布在世界各地,研究者要获得是很困难的。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有丰富的收藏,加上上图2010年引进了瑞典藏书家罗闻达收藏的1477年至1877年间的1551种西方汉学文献,就为这项工作奠定了基础。丛书收录的最早著作是1480年的《曼德维尔游记》。收录的最早的西译中国经典是《中国智慧》,当时的耶稣会士以“中国智慧”为题,将《论语》和《大学》的部分内容译成拉丁文,于清康熙

元年(1662)在江西建昌刊行。其中的《论语》部分是现存最早的《论语》西文译本,为海内孤本。收录的最早的文学作品是巴黎法文单行本《赵氏孤儿》(1755)。相信这些著作的集成出版会进一步推动中外学术界研究跨文化是如何交流的,知识是如何流转的,又是如何影响各地文化形态的。世界是多面的,发展是多线的,未来是多变的,绝不是一种文明可以一劳永逸独霸天下。欧洲文明虽然在探索时代和工业革命期间成为主导力量,但东方世界的早期知识和文化成就对其发展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如英国著名学者乔治·古奇所说:“古代东方的复活是19世纪最动人视听的事件之一。现在我们才知道,希腊和罗马并不是接近有纪录的历史的出发点,而是一系列成熟的文明的继承者。我们的整个看法改变了。古代东方已经不仅仅走向基督教欧洲的前厅,是按持续时间说占有纪录的历史的较大部分。”19世纪在乌尔、尼尼微等地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碑文和文字阐明了古代东方文明的成就。罗塞塔石碑的发现促进了埃及象形文字的翻译,打开了了解古埃及历史和文化的历史大门。这些发现促进了人们对历史的多样性、现实的丰富性、未来的可能性有了进一步认识,于整个人类而言,我们需要尊重不同族群对人类文明发展所作的贡献,需要一种更全面的学术研究,需要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叙事。(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本文为《东学西传文献集成》[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出]一书序言)

文化不是一株孤立地从种子长出的植物,而是一个受好奇心和实际需求与实际利益引导的、不断学习的过程。愿意从“他者”,即奇异的和外来的事物中获取养分,尤能促进文化发展。



乎把所有的希腊科学和哲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在10世纪,人们还认为,西班牙和北非不值得列入伊斯兰帝国疆域的描述中,因为它们只是“衣服的袖子”,但到12世纪,西班牙的托莱多至少有三种文化并存:这个地方有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注定要成为学术中心。12世纪的托莱多,吸引了来自基督教世界的众多学者和翻译家,因为在西方失传的希腊哲学和科学家的著作,都出现在托莱多,这些在托莱多、西西里等地完成的拉丁文译本注定会让欧洲为之沸腾:阿威罗伊“将使巴黎成为欧洲的知识之都”。伊斯兰世界对古希腊科学、古代东方文明向欧洲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波是18世纪的“东学西传”尤其是“中国热”。威尼斯商人的《马可·波罗游记》讲述了纸币、煤炭及其他闻所未闻的现象,引发了欧洲对中国壮丽色彩的惊叹,很快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书籍。马可·波罗的冒险经历对欧洲人的想象力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在出版后一个世纪内,西方出现了数百种《游记》手稿。中国的园林艺术、绘画、瓷器等,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精湛的工艺,受到西方人的喜爱和赞赏,到18世纪,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风”。启蒙时代的孟德斯鸠、莱布尼茨等哲学家对中国文化甚为钦佩,“伏尔泰相信中国统治阶级具有高度文化……他赞美中国的国家,能在一种精微而平衡的制度中容纳各种分子,并使他们达到一种具有丰富文化的境地”“推崇中国处于登峰造极之境”。这些认识推动了17—18世纪欧洲思想的转变。18世纪初期,法国东方学者安托万·加朗首次将《千零一夜》译成欧洲语言,广为传播,人们开始热衷于阿拉伯人的穿着、肖像、饮食等,引发了一股“阿拉伯热”。这些热潮是伴随着西方的扩张与东西跨文化交流的繁荣而出现的。

以上三波是广义上的“东学西传”,指的是西方世界对一切非西方文化的交流、借鉴与吸收,西方文明在与东方的互动中得到了深刻的塑造,凸显了历史上不同文明是如何依靠相互学习来取得进步的。东西方持续不断的交流导致了西方在技术、哲学、科学和文化方面的重大变革。认识到这一相互关联的历史,就明白了跨文化对话与交流对人类集体进步的重要性。在当今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促进这种交流对于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仍然至关重要。

中国文化向西方世界的传播

就中国文化向西方世界传播本身而言,历史上亦有三次大规模的“东学西传”:

一是汉唐时期,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开始传入西方。二是宋明时期,儒家思想通过贸易、文化交流等途径传播到西方,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儒家经典,为西方的思想启蒙和哲学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中国的四大发明在这一时期不断完善并广泛应用,其中印刷术、指南针等技术也逐渐传播到西方。三是明末清初时期,大量传教士来华,将中国的一些学术著作和文化经典带回欧洲,翻译成西方诸种语言。例如,来华第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将《四书》等儒家经典译成拉丁文,让欧洲人对中国的文化和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些著作的传播,引起了欧洲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对欧洲文化和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化不是一株孤立地从种子长出的植物,而是一个受好奇心和实际需求与实际利益引导的、不断学习的过程。愿意从“他者”,即奇异的和外来的事物中获取养分,尤能促进文化发展。人类历史的这类观念碰撞、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为我们积累了大量文献,为我们研究知识的流通、传播、交锋、接受、修正提供了丰富案例,亦为我们展望未来新形态奠定了历史之光与经验基础。

欧亚非的主要文明形态——中华文明、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拜占庭文明、拉丁基督教文明等,因相互之间的较为频繁的交流与碰撞、碰撞与转型,文化得以激活,不断焕发魅力。“事实上,只要是欧洲人创造的就是欧洲文明,正如基督徒创造的就是基督教文明,穆斯林创造的就是伊斯兰文明,犹太人创造的就是犹太文明。这几百年来,这些人都让这些文明有过非常大的转变。各种人类群体,与其用延续来定义,还不如用发生了什么改变来定义。”这就是我们研究“东学西传”的目的与意义。

然而,这些思想并不只是被动地吸收,它们往往会根据当地的传统和环境进行重新诠释、选择、调整,甚至抵制。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研究“东学西传”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推动作用,又要研究这一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变异情况;既要探讨“东学西传”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影响,又要研究其所带来的反作用,以及如何在不同社会生根发芽的奇妙变化。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详细的文献基础之上,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积累并不多,也不系统,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东学西传文献集成》的基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以后也许会启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文献长编》的整理工作。

希腊文明是罗马文明的基础,罗马文明是欧洲文明的基础,欧洲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基础,这条文明轴线在不断改变自身的呈现面貌。“像是一种接力跑,一面旗从某一人手里依次传递到另一人,如是不断替换。那面旗,先由希腊人传递给罗马,再由罗马人传给北方蛮族,现在是在拉丁、条顿民族手里……而且他们这面旗,也并不是自己原有的,乃是埃及人手里接来的。”可见,欧洲/西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文化概念,一个不断适应环境而变化的概念,是一系列文化碰撞的产物,这些碰撞既有西方外部的,也有西方内部的,随着地理范围的不断延展,文化影响力越来越超越欧洲/西方地理边界。

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知识、文化、观念和权力是动态变化的。历史不是由某单一“中心”主导的线性发展,而是不同地区之间复杂作用的结果,中心与边缘在不断互换,创新中心往往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历史可能被曾经一无所有者或边缘人所拥有。比如,13世纪欧洲的科技水平落后于东方世界,但英国科学家和哲学家罗杰·培根已认识到东方科学和哲学的宝贵贡献。他认为基督徒必须学习和利用异教哲学家的教诲和其他世俗学术领域的知识;他倡导语言研究,重视东方语言学习,以便阅读原始文献,这对于促进欧洲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他请求教皇克萊門特四世编纂出版一部包含当时所有科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包括从东方重新发现和学习的知识。

西方文明就是在不断与异域文明碰撞中持续演变的。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一直是全球历史的推动力,西方从东方汲取灵感、知识和创新的重要时期就是其标志。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的贸易路线网络,不仅促进了丝绸和香料等商品的交流,也促进了思想、技术和文化习俗的交流。从全球史、跨国史的角度来看,西方向东方学习,有三次大规模的浪潮。

广义上的三次“东学西传”

第一波是“东学西传”,时间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人们通常认为,东学西传的最重要成就是希腊人接受了腓尼基字母,并巧妙地对其改进,使之适合希腊语音。这一成就几乎可算是当时文化传播的典范。在这一时期,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埃及等地在建筑、艺术、风格、物质文化等方面深深地影响了希腊社会,奠定了“希腊奇迹”的基础。

第二波是“拉丁翻译运动”,这是西方世界首次把波斯、阿拉伯、印度的科学和哲学文献翻译为拉丁语,并把已经被翻译为阿拉伯语的希腊科学和哲学文献回译为拉丁语的活动,在12至13世纪达到高峰。阿拔斯王朝的穆斯林对知识有着无限的渴求,几

求学时期的兴趣转向

保罗·纳托普1854年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是一位新教牧师的儿子。高中时期,纳托普就对数学和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柏林大学和波恩大学求学时,深深着迷于古典学家、比较宗教学家乌泽纳(Hermann Karl Usener, 1834—1905)的古典学讲座;同时被音乐和诗歌等文艺作品强烈吸引。青年纳托普自己作曲、写小说;他既热衷于阅读歌德、海涅和但丁的文字,又倾心于聆听舒曼、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的音乐。

1874年,纳托普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音乐学习,并在那里研究自然科学的各种问题,还旁听了实证主义者拉斯(Ernst Laas, 1837—1885)的哲学课。当勃拉姆斯在1875年劝他不要以音乐为职业时,他实际上已经选择

成为马堡学派的一员

纳托普1875年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谋求教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先在文科中学完成了一年的见习期,又辗转于多特蒙德等地担任家庭教师。

1880年,纳托普在马堡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次年,在柯亨的鼓励下,他提交了教授资格论文《笛卡儿的认识论——一项对批评主义历史的研究》。纳托普接下来十二年的工作也是朝着这同一个方向进行的。可以说正

被遗忘的纳托普

■ 高桦

是在这些年里,他在与柯亨的交往中奠定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方法的基础。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对康德哲学做出认识论的重新解释。纳托普与柯亨持有相似的想法,主张一种方法上的观念论。在他看来,康德的两种认识来源(直观与概念)可以分别被视为认识的质料和形式。空间和时间是关系和大小思维的规定。这样一来,在康德那里被给予的东西就变成了被抛弃的东西,追问其本质是没有意义的。知识不是主观的,而是在现象的有法则的规定中被客观化。因此,综合的统一是认识的基本法则,它由范畴的基本功能(质、量、关系和模态)所决定。

与马堡学派其他成员相比,纳托普对于宗教、伦理与认识论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的兴趣。1893年,在担任哲学与教育学讲席教授后,纳托普潜心研究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在他看来,这两门学科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教育的工作面向人类精神,而哲学的任务则是借助各科学的知识而揭示人

类精神的创造性的逻辑基础”。他的教育学研究不仅产生了许多关于教育学的作品,还提出了一个旨在考虑教育中的共同体原则的社会教育构想。纳托普还参与了他那个时代的教育争论。例如,他提倡由高等教育机构参与的成人教育,主张所有学生应接受一门“人性范围内的宗教”课程,而非固定教义的宗教课程。他还倡导所有国民学校的教师都应接受高等教育,并在1905年和1906年坚决反对普鲁士新学制法案的草案。他对德国青年运动寄予厚望,希望它能成为“帝国时代内心空洞的文化生活”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克服社会弊病作出贡献。

来自学生的评价

1914年夏天,美国诗人T.S.艾略特从哈佛大学来到马堡参加暑期课程,遇到了纳托普。纳托普不仅帮助艾略特找到负担得起的住所,并且在哲学课程上授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缩短了艾略特在马堡的逗留时间,但在

此之前,他有机会为这位可敬的新康德主义者描绘一幅肖像。按照艾略特的记录,课堂上的纳托普经常摆出一副标准的教授的姿态:一只胳膊藏在背后,另一只胳膊则插在腰上。纳托普有着精灵般的耳朵和光秃秃的头盖骨,脸藏在椭圆形眼镜的后面。这副眼镜太大了,似乎给纳托普造成了一种阻碍,而未能帮助他看清现实。

艾略特这份语意双关的描绘可以被看作新康德主义在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和哲学家眼中的一个视觉缩影。而这个缩影在伽达默尔那里又得到了思想上的印证。1919年,伽达默尔来到马堡大学。在纳托普的指导下,他以论文《柏拉图对话录中快乐的本质》获得博士学位。伽达默尔对于兼具新康德主义与柏拉图研究者双重身份的纳托普做出了充满张力的评价。一方面,他将纳托普的思想态度描述为新康德主义的“冷静而自信的超然”,因而专注于“自满的体系建设”。这与安娜·阿伦特的观点保持某种一致,后者曾略微尖锐地指责新康德主义将哲学淹没在了“无聊的海洋”中。另一方面,伽达默尔又看到了“纳托普的永恒意义”,因为他“在自己的思想中证明了新康德主义与新柏拉图主义和康德继承者们的思辨观念论的内在联系”。伽达默尔将纳托普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视其为试图回答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你为什么出发?纳托普的答案就像在普罗提诺、费希特和黑格尔那里一样,“为了找到家园”。除了纳托普晚期哲学中新康德主义的内自我克服之外,纳托普对新康德主义的意义还在于,与柯亨难以理解的作品相反,他知道如何以清晰易懂的形式呈现他的思想,为马堡学派思想的传播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著名的哲学家史、《康德传》作者曼弗雷德·库恩曾宣称:“新康德主义者的受欢迎程度下降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问题不再是我们的问题,而与之相反,康德则似乎仍然与我们有某种相关性。”但经过对纳托普的生平与思想的简单考察,我们或可明白:纳托普思考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过时;他之所以被遗忘,只是因为我们在一个日趋碎片化的世界中,不再能够接纳一个强调综合统一的康德哲学的解释体系。(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 曼德维尔画像,约1459年



▲ 《曼德维尔游记》1524年西班牙语译本首页